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建

吴汉全

(北京师范大学 法政所, 北京 100875)

摘要: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处于创建阶段。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对西方的社会学进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社会问题,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

关键词: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建;开创者

中图分类号: K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02)04-0093-04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萌发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结果。李大钊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最早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对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清理,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着力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阐述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阐述是与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分不开的。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六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章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都有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过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起了播种、催芽的作用。”^{[1](P43-44)}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的贡献作了比较充分的说明,认为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主要是:“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2](P31-32)}李大钊认为正是唯物史观发现了“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指出了社会学上最为重要的“经济现象”,并且

应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去“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因而解决了从前社会学上不能解决的问题,才使社会学“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笔者赞同这样的看法,即“李大钊在这里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研究,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对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关系的正确论述”。^{[3](P48)}由此我们认为,李大钊是在中国倡导一种新型的社会学——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学。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原则。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4](P19)}李大钊在这里所说“有些相类”,并非指唯物史观和生物进化论“有些相类”,而是说在社会学史上唯物史观对社会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与进化论对生物学的发生所起的作用相比“有些相类”。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的根本法则,并认为后来其他学者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社会都是源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法则,两者是统一的。“因为马氏述其历史观,却关联历史和社会。原来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5](P316)}李

李大钊把唯物史观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法则,但没有把唯物史观对社会学的指导进行机械的庸俗化的理解,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中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最为重要;……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2](P323)}

李大钊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具体地阐述了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大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述,旨在说明由经济关系所生成的社会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宗教关系等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也就是说,唯物史观不仅是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而且对社会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李大钊著《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系统地叙说了自己的这一基本见解,他说:“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指唯物史观,——引者),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2](P326)}这就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李大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科学阐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时,还尤其注意区别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异同。在他看来,社会学与历史学都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都是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是有其共同点的。具体来说:“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亦是社会;社会学的起源,实亦起于历史上理论的考察,是由欲于历史寻出理法的动机自然发生出来的东西。”但尽管如此,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可认作全为同物”。社会学与历史学,“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4](P422)}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阐说,主要集中在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学的法则的阐说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其他理论分析不够,这是时代的局限。不过,李大钊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精神的,在中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李大钊所阐释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着重研究“人间”的现在者的学问。这个结论在当时是极为深刻的,在今天也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二、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清理

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除重点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外,还必须吸收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可取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社会学的杰出人物韦柯、孔德、圣西门等进行了评估,对他们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

李大钊认为,韦柯是社会学的先驱,于社会学的开创有特殊的贡献。对于韦柯的社会学思想,李大钊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指出韦柯在1725年问世的《新科学》,是“名噪一世的著作”,“定征韦氏在近世社会学者界实占重要的位置”^{[2](P280)}。李大钊认为,韦柯作为社会学的先驱是应肯定的,但他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很大的缺陷。他的研究方法即为经验的归纳法,其锐利的观察力虽然往往带有唯物的倾向,但“他把自然的环境及于个人及国民的影响,看得过大”;他的学说具有超前于时代的性质,然而“他并未宣明或知认何等进步论”,而且“他的想象在他的说明中很迷惑很混乱的”,尤其是“他的根本的观念,在社会史的说明须寻之于人类精神中”。李大钊还指出,韦柯提出了“反复”的原则,用来解释历史,如果说有价值的话,“这只是指社会的运动可以视为螺旋的升高”,“但他自己未曾直接的陈白此断案,或敢于为何等的证明”^{[2](P282-284)}。在当时的学术水平不高、韦柯的学术思想刚刚被承认的情况下,李大钊对韦柯的社会学思想有如此的认识,确是难能可贵的。

李大钊对圣西门的社会学思想也进行重点评述。圣西门社会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在圣西门看来,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系和堆积,而是符合规律的现象。历史发展的过程就像数学“级数”,“这个级数的前项是过去,末项是未来”^{[5](P90)}。所以李大钊说:“桑西门是寻求理法于历史的一人,所以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先驱者”^{[4](P422)}。李大钊对圣西门的社会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基于对圣西门社会学思想的总体认识,李大钊认为:“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途程而为开拓唯

物史观的道路者, 实为桑西门。^{¶21(P292)} 从而肯定圣西门在社会学思想史上的地位。李大钊在承认圣西门为“社会学之航梯”的同时, 也指出: 圣西门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 而“空想社会主义, 以为社会之进步, 由于理想”。“社会主义以理想为根据, 极不稳固”。^{[4](P14-15)} 而且“桑西门以为新社会的学说, 必须不只是由教育与立法所传播的, 必须为新宗教所裁决”。对此, 李大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指出: “现代的世界亦须是一个社会的组织, 但那普遍的主义, 将是科学的, 不是宗教的。精神的权威, 将不存于僧侣, 而存于指导科学及公共教育的进步学者。”^{¶21(P299-300)} 李大钊的认识在今天看来还不够全面, 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能对圣西门在社会学上的地位作如此的分析, 实在是极为难得的。

对西方社会学家孔德, 李大钊多次对其在社会学上的地位进行分析。奥古斯特·孔德是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 首先使用“社会学”(sociology) 的术语。孔德分两个理论方面研究社会学, 形成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理论, 前者研究“社会整体内各成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平衡”; 即“秩序”的前提和条件; 后者则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与反作用, 即“进步”与“进化”的基本运动。

李大钊对孔德社会学思想的介绍突出了孔德知识的进步观, 即从知识进步的视角阐述社会历史的进步过程, 而不是以神意来解释社会, 而且社会是一个遵三阶段发展的过程。李大钊不仅介绍孔德的社会学思想, 更重要的是从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来界定孔德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在论述圣西门时, 李大钊曾说: “那些十八世纪的思想家, 把‘进步’当作一个立在一个极不充分的推论上的单纯的假设, 遗留下来; 他们的承继者乃依发现一个和引力的物理法则一样确实的社会法则, 以求把他提到科学的假设之列, 这是桑西门的目的, 亦是孔德的目的。……孔德是桑西门的承继者。”^{¶21(P293-294)} 孔德何以在社会学史上成为圣西门的“承继者”呢? 李大钊认为, 孔德继承圣西门的知识历史观, 即以为知识决定宗教, 宗教决定历史, 因而“承继他(指圣西门)的知识的历史观而发扬光大之者厥为孔德”^{¶21(P296)}。从社会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 孔德确是圣西门的“承继者”。孔德曾宣称自己社会学体系是一切现有知识的综合; 圣西门说, 一切科学都以假设开始, 经过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 而以实证结束。孔德对圣西门的见解加以系统化, 提出全部人类思想经历了三个独立的阶段: 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当时, 李大钊就认为孔德在社会学上是圣西门的“承继者”, 足见李

大钊对孔德评价的公允。

李大钊对西方社会学家的评述在今天看来还有不够全面的方面, 但在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尚在开创之时, 能注意西方社会学发展情况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的评析, 这在当时确是不多见的。

三、对中国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李大钊对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还表现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开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体现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容, 涉及面很广。在此, 只能就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促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问题作初步的梳理。

李大钊的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 回答人们对社会学的种种偏见与误解, 阐明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当时中国学术界有人误解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为同物, 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法则, 促进社会改良的制度”; 不知道社会学的真正含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对此, 李大钊指出: “社会学是一种科学, 研究社会上各种现象及其原则与一切社会制度的学问, 且用科学方法, 考究社会是何物, 发明一种法则, 以支配人间的行动。所以社会主义是社会学中应当研究的一部分, 并非社会主义即社会学。”^{¶41(P3)} 对社会学作了科学的阐述, 并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主义的任务。李大钊在阐述自己的社会学思想时还郑重指出,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与政治, 是互为因果的, 不可偏重一面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最终都要靠社会政治力量。“因为社会问题, 往往混入政治问题。即如烟酒问题, 若从小里看, 似乎用不着政治; 但若是视为和民族的强弱有密切的关系时, 则不得不从政治、法律方面去解决他, 因为政治的力量很大, 最容易收效果。”^{¶41(P241-242)} 这说明, 李大钊的社会学思想与当时中国的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是联系在一起的。

李大钊特别注意对社会宗教问题的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原理, 李大钊指出: “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的左右的, 没有不随着他变迁的”, 历史上宗教都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变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以是原因, 自然现象、人类社会都脱去神秘的暗云, 赤裸裸的立在科学知识之上, 见了光明。”^{¶21(P105,108)} 正因为宗教这一社会现象随着社会变动而产生和发展, 因而宗教也是必然随经济的变动而消亡。为了宣传唯物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长期以来通过宗教对中国人民进

行的奴化教育,解决宗教信仰的社会问题,1922年李大钊参与发起和组织了“非宗教同盟”。李大钊著文指出:“我们坚信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把所有的问题都想依赖宗教去解决,那是一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宗教是向人们宣传廉价的妥协性的东西,它妨碍彻底探求真理的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巨大障碍,因而我们必须竭力加以反对。”李大钊表示:“我们反对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单单是反对基督教,而是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有的宗教。”^{[4](P203)}因为“宗教是以信仰的形式示命人类行为的社会运动,宗教的信仰就是神的绝对的体认,故宗教必信仰神。”因此,“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响之下,断乎不能存在”。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的关系的表现,“宗教的教义,多有以神为介而阐导博爱的精神的”,然而“没有自由平等作基础的博爱,而能达到博爱的目的么”^{[4](P214,216)}李大钊对宗教这一社会问题的分析,表明他的社会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李大钊对社会问题极为关注,写有《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阐明中国社会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他写道:“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6](P22-23)}李大钊指出,童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外人的行政机关,他们断乎不会施行那为保护童工利益的行政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不可。”^{[6](P25)}在当时,能系统地研究童工问题的人实不为多见。李大钊还写有《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指出工人劳动者生活无以安宁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4](P343)},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深受资本主

义制度剥削的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李大钊对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予以十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13年,李大钊就写有《原杀(暗杀与自杀)》一文,认为“社会不平”、“政俗不良”是导致自杀的基本原因,而“绝望亦为自杀之最大因缘”^{[7](P46-47)}。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李大钊则更加注意对自杀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一个自杀的青年》(1919年11月)、《青年厌世自杀问题》(1919年12月)、《论自杀》(1922年1月)等专论自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上的自杀现象源于黑暗的社会制度。李大钊的《论自杀》(1922年1月)这篇1.3万多字的文章,分十个部分对自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论自杀》征引大量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中外学者关于自杀的论述,是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杀问题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论文。由此我们认为,李大钊的《论自杀》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李大钊的社会学思想在今天看来还不够全面,还有许多不足,但这无损于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基的业绩。李大钊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努力及所形成的社会学的传统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李大钊不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是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先驱,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韩明汉. 中国社会学史[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 [2] 李大钊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3] 袁方. 社会学百年[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4] 李大钊文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5] 圣西门选集(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 [6] 李大钊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7] 李大钊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LI Da-zhao and the Initiation of Marxist's Sociology in China

WU Han-qua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Marxist's sociology in China was initiated in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Li Da-zhao contributed to Marxist's sociology in China as he disseminated Marxism, studied western sociology, investigated the problem with Marxism in China. LI Da-zhao is the initiator of Marxist's soci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LI Da-zhao; Marxist's sociology in China; initiated; the initiator